

杜威与孙中山的知行观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孙中山对杜威知行之辨的批判和继承。杜威的知行合一论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具有多面性。杜威和孙中山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知行合一，但在合一的前提下，又稍有分歧：杜威侧重从互动维度解知行关系，孙中山侧重从难易维度谈知行互动关系。孙中山的以难易说知行的做法对杜威的知行合一观作了某种解释和改造，其间也渗入了自己的思考。当然这种解释、改造和思考本身是以中国思想传统、现代社会现实以及当时哲学界所议论的话题为背景的。

关键词：知行合一，知难行易，认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杜威的知行合一观引起了许多现代中国哲学家的兴趣。它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在知行之辨的现代演进过程中，历史上不同的哲学家对之作多角度阐释，有的从难易之辨来解析，有的从先后之辨来探讨，有的从互动关系来立论。杜威和孙中山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知行合一，但在合一的前提下，又稍有分歧：杜威侧重从互动维度解知行关系，孙中山侧重从难易维度谈知行互动关系。

一、以互动说知行

这里我们先对杜威的知行合一观稍作辨析。

从理论上分析，知行合一有两种合一法：逻辑上的“合一”和过程上的“合一”。知行相互依赖，浑然一体；知中已有行，行中已有知；知内含行的趋向，行以知为指导。这种“合一”是就逻辑上说的，是一种静态的描述。过程上的“合一”，则具有动态的特点。它指的是将知行置于实践或认识过程之中，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知行互动，由知到行，又由行到知，贯通一气。杜威讲知行合一侧重在后一种说法上，即置知行于过程，在生活（实践、操作）过程中合一知行，知行互动。他讲知行观固然也讨论认识过程中知与行的先后问题，而其侧重点在实践层面上的体（目的）用（工具）互动问题。

据杜威的理解，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在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有机体既要对外界事物有所认知，又要对外来刺激有所反应，知和行无法截然分开。“知识不是孤立的，自我充足的东西，而是包罗在用以维持和发展生活的方法里面的。”^[1]进一步说，知识是行动的工具或媒介，“思维是用来控制环境的工具”。在杜威那里，行动主要不是知识的范导性原则而是一种构成性原则：知识不仅应当化为行动，更重要的是，它只能诉诸行动；看上去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做）的问题。^[2]他把 knowing 和 knowledge 统一起来。人们在现实生活里，总是要面对许多问题情境，为了解决问题势必要采取行动或操作，在行动中需要运用思维 and 知识。同时，人们通过操作，把一个有问题的情境改变成为一个解决了问题的情境，其所得的结果便是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又可谓行

动之成果。杜威认为，知识“绝不是一种安乐椅上的事情”，“所以不是一种安乐椅上的事情，原因是由于他不是完全在脑中或脑和发声器官中进行的一个事件，他包含各项考查，以便获得有启示性的论据，还包含物质的分析，把这些论据弄得更纯净，更精密；他包括各种读物，以求获得情报，包括许多字以供实验，还包括许多计算，以便经营所采取的观念或假设的旨趣。”^[3]换言之，行动构成了知识。

从杜威对感觉的解释中，可较清楚地看到知识和行动的姻缘关系。通常的看法是，感觉属知识范畴，它可被当作粗糙的或低级的知识，是“知识的门户”，与行动无甚关系。但是杜威置感觉于行动维度，从行为而不是从知识层面来解析感觉：“感觉失去其为知识门户的地位，而得其为行动刺激的正当地位……它是行为的引线，是生活求适应环境的一种指导因素。它在性质上是触发的，不是辨识的。经验论者和理性论者关于感觉的知识价值的争论全部归于无用。关于感觉的讨论是属于直接的刺激和反应的标题底下，不是属于知识的标题底下的。”^[4]触发、刺激和反应属于行动类别，辨识属于知识类别，杜威将感觉划入行动之域，以行释知（感觉）。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引申，即认感觉和知识为一种行动方式，认知为行的一种状态。这样，知识和行动便实践过程中得到内在的统一。

杜威的知行统一论，对传统知行观造成较大冲击。先前的哲学家将知行分作两途，确定性在知的一面。人们在纯粹的认识（理论）活动中，借助心中确切地占有有不变实在的办法来寻求确切性。在那个外在的、低下的实践世界里，有的是偶然事故和冒险经历，确定性根本无从谈起。而现在人们合知行于一途，以知识为工具，通过对具体活动、事物进程的控制来寻求安全。换言之，追求理论上的确定性，在杜威那里，已经转换成对行动中安全的寻求。正如中国哲学家张申府所评述的，杜威“以为只由行而得的知识，才有确定，才可靠……他以为以‘作’去学好于以理论去学。就因那样子较为可靠，较为确定。”^[5]

但是，行之安全向知之确定性这一转换本身，并不意味着行动好于或高于知识，并不意味着实践优越于思维：崇行贬知。知识和行动是对等的，在具体活动中它们经常而有效地相互作用。知识固然是行动的工具，但行动也是知识的手段。当动作或实验操作受知识的指导时，它便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并不是目的，这时的“目标和目的就是利用主动控制对象的手段在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更为可靠、更为自由，更为大家广泛所共享的价值”，^[6]相对于此价值，知与行都是工具，都是用。据此，杜威反对下列倾向：为纠正原先人们推崇冥思的知识而轻视实践、扬知抑行的做法，现在把它“简单的颠倒一下”就行了：即扬行抑知。这种倾向实际上是在另一种形式的庇护之下重新回到了知行分立的立场，继续着古希腊以来的知行二元论传统。但是杜威知行合一观的实质“是要把知识与实践两者都视为在经验存在中获得善果（即各种优越的结果）的手段。”^[7]知与行是统一的，在工具（用）维度上得到统一。这正如张东荪所理解的：知行统一并非“抑知以就行”，乃是“提行以同知”。^[8]

知行相互作用，互为工具，正揭示了杜威知行合一的主旨。它对皮尔士的知行观有一种纠偏作用。皮尔士的观点是：认识和思维的目的在于行动。“思维的整个机能在于引起行为习惯，与思维相关但与它的目的无关的一切，则是思维的累赘，而不是它的一部分。”^[9]一切与行动及其效果无涉的认识，均遭剔除，知必须诉诸行。这种对行过分高扬的理论姿态，在杜威的知行合一观那里稍稍得到抑制。当然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较好克服，知行合一于行的倾向仍是杜威知行观的内在理路。这一理路和下文要讨论到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不免有相切近之处。

二、以难易说知行

在现代中国知行之辨的演化过程中，孙中山的知行观是一个重要环节。综合地看，他探究知行之辨在多重层面上展开：既讲先后关系，“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而后知，知而更行；又讲难易关系，推翻传统知易行难说，另辟新说。孙中山比较侧重从难易之辨讨

论知行互动，得到知难行易之说。这和杜威的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有颇多“暗合”之意。

知易行难说较早出自《左传·昭公十年》中“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命题，《尚书·说命》也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它告诉人们，知道或了解事实真相或关系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依理而行。进一步引申其社会意义，指它反对实际的变革，一味安于现状。孙中山以知难行易说来对抗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这不仅仅是一种词序的颠倒，也是对“知行”内涵的深化和拓展。古说之“知”重在道德善恶之知，“行”重在道德方面的躬亲践履，孙中山之“知”重在革命理论，“行”重在革命活动。

更重要的是，这也不仅仅是内涵的深化，而是对传统知易行难说的一种革命性扭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孙中山看来，知易行难说“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10]这对革命党人起了毒害思想之作用。“知易说”让人轻视革命理论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导致许多革命志士对革命理论缺乏坚定的信仰。“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如若思想不统一，理论受贬视，行动自然难以奏效。“行难说”让人对革命实践具有惧怕心理，不免畏畏缩缩，“把极容易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最终使人丧失在艰难时期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11]针对知易行难说之流弊，孙中山奋力倡导知难行易说，一方面强调革命理论之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强调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因已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另一方面，强调实践的可行性，鼓励革命党人的斗志，克服害怕行动害怕斗争的畏难情绪，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孙中山探讨知行之辨主要不在说明两者的逻辑关系，而在为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寻找理论根据。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对传统知行观的一种突破，实现对古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批判和变革。不仅如此，它还有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思想根据。近代哲学家讨论知行之辨沿着两种路向行进：魏源讲“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章太炎讲“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都在一定意义上抵及行先知后思想，强调行；康有为讲“以智为先”，谭嗣同讲“贵知不贵行”，基本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知。孙中山延续的是重行之路向。他联系革命斗争的实践，有见于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弊，有见于古语“知易行难”的毒害，把极容易的事视为畏途，故而倡导“行而后知”，“能知必能行”。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将“先后”提法转化成“难易”之辨，得出“知难行易”的结论，隆重推出重视行动这一主旨。

知难行易说正待出炉之际，恰好得到来华讲学的杜威之首肯和印证，这为知难行易说的广泛传播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深入人心。反过来说，随着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传播，杜威的知行合一思想也随之而广为流布。两者相辅相成。杜威来到中国后没隔多久便和孙中山会晤。谈话的内容之一涉及知行关系。当时，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已经形成，所著《孙文学说》正待出版。他在书里曾叙及和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12]杜威此语指证出：西方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大都持知难行易说。孙中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杜威的话作佐证，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说的正确性，因为它完全和西方哲学家的一贯看法相一致。通过“质证”，孙中山毫无疑问增加了自信心，强化其“重行”信念。

从当时的文献资料来看，杜威基本赞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他曾在几处谈及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在一封家信里，他说：“昨天我和前总统孙逸仙博士共进晚餐，发现他是一位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将要出版。书里说，中国人的弱点由于相信古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由此他们不喜欢行动，却认为得着事理的完全了解是可能的。而日本人的长处，却在于他们甚至不知而行、勇往直前，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中国人怕行动发生错误，因而袖手不

动。所以他为他的国民写了一本书，告诉他们‘知难行易’。”^[13]可见杜威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抱有浓厚的兴趣。

可以说，杜威比较正确地抓住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实质：重视行动。在中国的演讲中，他多次对孙中山知行思想加以发挥。他用行动、科学试验来演绎知难行易。他演讲道：

实行就是求知识。知识要经过实验的陶练，才能正确。中国大政治家孙逸仙先生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两句话，贻祸中国不浅。就是使人怕事偷懒，养成泄沓昏沈之风。这话实在很对。我们虽然不能逆料成败，却不能不冒险去行。多行一次就多一番经验。多一番经验，就增一度知识。所以知识和信仰——一种情绪——有密切的关系。要是信仰，一知便行，行了知识自然增进。要是先求知识的完全，然后去行，恐怕终生也无机会去行呢。英国有一句俗话说，陆上学溺水。那些求知不实行的人，就好象学泳不入水。

我闻中国古代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话。试验的方法，却与之相反。这是只有行然后可以知。没有动作，便没有真的知识。有了动作，然后可以发现新的光明，有条理的事实，以及从前未发挥的知识。故曰：“没有行，决不能有真的知”。^[14]

杜威对孙中山知难行易命题的充分肯定，主要是肯定孙中山对行动、实行的强调，以及他对忽视行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分析。正是在“重行”向度上，杜威和孙中山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贺麟也曾作过类似的说明：以知识出于行为是实用主义中最健康的观点，与中山先生“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思想“暗中符合”。^[15]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孙中山是在知行合一于行的意义上解读杜威知行观的。从杜威和孙中山的“暗合”关系看，杜威知行合一论和中国现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我们从中似乎也可窥见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五四”前后声誉鹊起的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讲，讨论知行之辨有多重向度，或先后或难易。先后关系是一种逻辑的或事实的描述，而孰难孰易是一个价值判断。孙中山从难易维度探究知行观，也就是从价值层面判断知行关系，他得出强调行动的结论。这和杜威的知行合一于行的观点有类似之处。

从逻辑上看，如果对知行合一作抽象的辨析和引申，它往往包含两种可能的演化方向：知行合一于行（销知归行）或知行合一于知（销行归知）。杜威在知行合一的前提之下，偏重于“行”一面。他以行释知的思路即婉转表露了这一倾向。例如他说：“知就其本义而言也就是做。”^[16]“就‘行动’一词字面上和存在上的意义而论，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就是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去接受从外面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感觉。”^[17]这一说法并不是将知识和行动直接等同，模糊知行的界线，而是将知识或观念规定为一种行动方式，在行动维度上解说知识，以行释知。但是，杜威以行释知的思路仍蕴含着销知归行的倾向。当他说“认知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时，^[18]便把知还原为行，认知为行的工具，知行合一于行的观点得到了坦直的表述。这一观点在工具主义的真理观上、“从做中学”的教育方法论上又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渗透。也正由于此，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常被称作“行动或实践哲学”。重视行动便成为孙中山和杜威的一种共识。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杜威哲学对孙中山有所影响，还不如说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对杜威有所影响。

但从另一层面看，孙中山和杜威对于知行之辨的解释又有着比较大的差异。如果说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传统的翻转，那么杜威知行合一观的矛头对准了西方知行分立的传统。杜威认为自古希腊以降，知行分立一直是西方哲学的痼疾。他的知行合一观正建立在批判传统知行分离的基础之上。古希腊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只有在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确定性、安全性；第二，达到内在稳定确切的东西的唯一道路是知识而不是行动；第三，实践活动是一种低级的事务，它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人类具有兽性和从环境中竞求生存的需要。^[19]到了现代，尽管科学日新月异，可这些思想仍旧保存下来，致使科学知识和道德行动之间，对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于行动的合理指导之间，仍然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即知行分立。对杜威来说，这是个必须要攻破的“堡

全”。

从学理上看，知行分离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心物二元论在知行关系上的逻辑推演。杜威在存在论上以经验统摄心物，这种观点进一步落实到认识论上，便得出知行合一观。相形之下，认识论上的知行合一，对知行二元分裂的反动，也反衬出杜威拒斥形而上之超验实体的倾向。

尽管孙中山和杜威来自两个文化传统，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是孙中山借用杜威知行合一观，佐证他的知难行易思想，使它们在“重视行动”维度上沟通起来，同时又对传统的知易行难思想作了某种程度的变革。

总的说来，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对杜威的知行合一观作了某种解释和改造，其间也渗入了自己的思考。当然这种解释、改造和思考本身是以中国思想传统、近现代社会现实以及当时哲学界所议论的话题为背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的知行合一论一传入中国，即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注目和讨论，这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因为知行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乃至近现代哲学史上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传统哲学为杜威知行合一思想的引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因为杜威知行合一于行（实验、实践）的思想契合了当时的时代变奏韵律。历史地看，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倡导行动和试验的时代，它不崇尚静观，也不崇尚冥思。在政治上，先有太平天国，后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还有声势浩大的、促使清王朝垮台的辛亥革命。在文化教育上，各类新式学校、出版翻译机构、报馆、学会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近代历史的舞台上。许多有识之士面对民族和国家的危机，挺身而出，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在行动中思辨，又在思辨中行动。这样一种知（思辨）行（行动）合一、又稍偏重于行动的时代节奏，无疑为杜威的知行合一观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手脚之空间；同时，近现代中国知行之辨的演化也深深地烙上了杜威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子。

参考文献:

1.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
2. 童世骏：《理性、真理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夏季卷
3. Ratner 编：《杜威哲学》，台北：“教育部”1979年
4.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
5. 张东荪：《理性与良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6. 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 V. 5,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7.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
8. Evelyn Dewey, (ed.)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Button, 1920, p. 166. 另参见 Dewey,
9. Characters and Event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9
10. 《杜威五大讲演》，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
12. Dewey,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New York, 1916

注释:

- [1]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6页。
- [2] 参见童世骏：《理性、真理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夏季卷。
- [3] Ratner 编：《杜威哲学》，台北：“教育部”1979年，第608页。
- [4]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6-47页。
- [5] 《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2页。
- [6]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第26页。
- [7]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第26页注1。

- [8] 张东荪:《理性与良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 [9] 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 V. 5,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400.
- [1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
- [11] 《孙中山选集》,第159页。
- [12] 《孙中山选集》,第157页。蒋梦麟在他的《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里也录有此事: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孙中山对杜威话语的叙述和蒋梦麟的记录大致相同,足证孙中山引述之可信。
- [13] Evelyn Dewey, (ed.)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Button, 1920, p.166.另参见 Dewey, Characters and Event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9, p.220.其中有类似的记载。
- [14] 《杜威五大讲演》,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1、138页。
- [15]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9页。
- [16] Dewey,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New York, 1916, p.331.
- [17]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第82-83页。
- [18]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第124页。
- [19]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第36页。

Dewey and Sun Zhong-shan Knowing and Doing idea

Gu Hong-li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department)

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ritic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Dewey and inheritance. Dewey's integration of modern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Dewey and the Sun Yat-sen is the integration of a basic stand, but under the prerequisite of integration, some differences : Dewey focu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Dimension Solutions, Sun focused on dimensions from the difficult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Sun knows that the way to eas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wey gave some expla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mong into their thinking. Of course, such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think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Philosophy and social realities of the modern world was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as background.

Key words :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unity , know difficult than practice, Epistemology, Practice

收稿日期: 2006 - 12 - 24

作者简介: 顾红亮, 男, 华东师大哲学系副教授